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

在规范和偏离之间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研究

章艳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

在规范和偏离之间

——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研究

章 艳 著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规范和偏离之间: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研究/章艳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3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

ISBN 978-7-5135-0622-9

I. ①在… II. ①章… III. ①英语—小说—文学翻译—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英语—小说—文学翻译—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848 号

出版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李婉婧

封面设计:覃一彪

版式设计:涂俐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http://www.fltrp.com>

印刷: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50×980 1/16

印张:10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5-0622-9

定价:26.90元

* * *

购书咨询:(010)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2062200001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编委会

顾问：顾曰国

主任：马秋武

编委：张德禄 朱建华 李扬 吴侃 吴建广

总序

凝结着同济外语学人辛勤劳作与智慧结晶的《同济外语学术论丛》即将陆续出版了。这套论丛不仅仅是近年来当代同济外语学人学术研究的成果汇聚，更是百年同济人文研究薪火相传的历史延续和见证。

同济大学人文教育与研究历经沧桑，源远流长。早在1914年，后来成为美学大师的宗白华入读同济医工学堂，1915年有了法政科毕业生。“五四”时期，同济人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探讨更是颇具影响，如在“五四”前诞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魏时珍、宗白华等同济学生曾是《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1927年秋天，诗人殷夫考取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半年后即翻译出裴多菲的名诗《格言》，成为当时的高材生。1936年，冯至和杨晦先后任教于同济，冯至任德文教授兼附中校长，40年代初西迁昆明时才转入西南联大。1945年，同济大学正式设立法学院。1946年，从四川返沪后即准备创建文学院，先扩理学院为文理学院，增设哲学、外国语文学、中国文学三系。1948年文理分院，文学院增设历史学系。至此，同济大学已构建起由理、工、文、法、医五大学院组成的综合性大学的完整框架体系，并聚集了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人文社科学者，如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哲学系主任熊伟，外文系主任陈铨，历史学系主任吴萍，法律系主任吴歧等。另外，章士钊、郑寿麟、杨一之、陈康、冯契、廖馥君等著名教授都曾执教于同济。

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等先后转入复旦。外国语文学系最先于1949年迁入复旦，而后部分教师转至南京大学。经过这番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原有的文、理全部学科和医、机、电、船、水利等多种优势学科，连同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全部调出。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汇聚了国内多所院系土木建筑等的学科力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土木建筑等工程类高等学校。

多年来，同济大学的土木建筑在国内外一直保持其优势学科地位，但重建同济文科和医科始终是海内外同济人的一个夙愿。改革开放以来，同济大学实施恢复对德交往和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战略，文科自然成为学校整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大背景下，同济外语学科秉承“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之精神，脚踏实地，认真谋划，积极进取，1998年在原德语系、外语系的基础上组建外国语学院。近年来，在学校鼎力支持下，学院外引内促，全球招聘，贤才毕至，实力弥进。2006年，获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2010年，又顺利通过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审，至此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学术型学位和专业性学位兼备的、完整的学位培养体系。

辉煌同济，百年外语。自1907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德文科初创，1946年设立外国语言文学系，至1998年外国语学院成立，我们一路走来，承继传统，前贤后学，矢志不渝，为建设和发展同济外语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与历史上蜚声学界的同济学人相比，当代同济外语学术研究的水平尚有一定差距，但我们抱定了以学科发展为目标，以弘扬学术为己任的宗旨，近年来随着学院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努力建设与发展同济外语事业已成为当代同济外语学人的共识。《同济外语学术论丛》中的每一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们的心血、汗水与智慧，都是为实现再铸同济外语历史辉煌这一目标做出的奉献。我们在努力，我们在进步，相信这些成果会得到学界同行的接受和认可，也衷心希望各界学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批评、支持和帮助。

是为序。

马秋武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2011年1月30日于外院汇文楼

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历史

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期，翻译小说的数量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因此当之无愧地列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次翻译高潮之一。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清末民初的小说译者及其译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传统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里，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著而受到批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不能跻身于正统“翻译作品”之列。

对某一事物的结论往往取决于论者的视角。所以，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只有转变视角，把视线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选择以译序跋、发刊词、书评等文本外材料为线索，研究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规范以及译者在这些翻译规范面前的应对，以了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了解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如何配合和抗衡这些规范，并由此去理解他们为了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巨大鸿沟之间搭设起沟通的桥梁所作的努力。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对此期小说翻译已作的结论，而是要关注这个结论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此期翻译小说“不忠实”的原因在哪里？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决定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翻译小说因何而获得了在译入语文化里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些问题的解答，本书试图证明：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能囿于文字或文学价值的判断，而要考虑到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否则，任何结论都可能失之偏颇。本书作者希望通过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应对的研究，提供一个从译入语文化角度去描述和理解一个时期翻译活动的个案。

本书共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明确界定了本研究中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时间跨度，介绍了此期小说翻译的概况，并回顾了“五四”时期、“五四”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70年代末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四个时期对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和小说翻译的研究情况。相对于前三个时期偏重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描述性的翻译史类著作，为处于文化转向中的翻译研究

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关注此期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笔者指出，翻译界对于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研究视角的转向，除了得益于史料的收集和日益宽松的文化环境及学术氛围外，更重要的契机还在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勃兴。本章特别介绍了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图瑞的翻译规范理论，并特别强调，翻译规范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对一个时期翻译规范的研究只能通过对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进行客观的描写，然后从中总结出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规范。因此，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将贯穿本书的写作。

第二章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缘起进行了梳理。本书认为，此期小说翻译的崛起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文学现象，它至少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中体西学”思想的彻底失败；二是维新派为了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大造舆论，人为拔高小说的地位；三是传统诗学中“文以载道”的思想和当时西方话语的助力。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维新派取代洋务派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意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在政治制度上学习外国，重视翻译政治、法律、教育、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但是“百日维新”的失败使得维新派认识到靠清政府维新救国之路行不通，他们只能把注意力转向群众，并且意识到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小说。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向属“小道”，没有资格跻身于文学殿堂。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维新派大造舆论，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纷纷著文，大谈小说对影响世道人心的重要性。梁启超一边批判中国旧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从而为翻译小说的登堂入室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小说地位的顺利抬升还得益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诗学，二是西方话语的借用。梁启超们倡导新小说是为了开启民智，这和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一拍即合，因此“新小说革命”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响应实属意料之中。同时，欧洲小说的鼎盛及其在上流社会的崇高地位对晚清知识分子小说观念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中国新小说运动的有力支持。

第三章首先详细分析了图瑞的翻译规范理论，特别强调指出，图瑞所提出的“翻译规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存在于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但是图瑞显然只考虑到了译前规范和操作规范（文本转换开始前和进行中两个阶段），对文本语言转换之后的其他活动，如译者在完成翻译之后

的行为以及读者的期望和接受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本书在图瑞所提出的“译前规范”、“操作规范”基础上补充提出了“译后规范”这个概念，对这三种翻译规范所涵盖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纲对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规范进行了透析。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译前规范由翻译传统和翻译方针组成，其中翻译传统表现为三个方面：1、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传统；2、以文胜质的翻译传统；3、口授笔译的翻译传统。翻译方针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针对翻译活动的纲领性指导原则，用以确定翻译目的、翻译内容以及预期的翻译方法等。为了探寻清末民初期间的翻译方针，本书选取了1901年到1915年期间的16种报刊杂志，对其名目繁多的发刊词中涉及创刊宗旨、翻译内容、小说语言、译著比重的部分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翻译方针经历了从最初的高度统一到后来的多元性这样一个过程。

操作规范涉及到语言材料的篇章切分、信息的增删改易和语言风格的确定等，可以大致把它等同于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翻译界对清末民初小说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的措辞可能有所不同，宽容程度和认可程度也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来看，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被归于“意译”或“译述”之列。至于语言风格，不同的译者由于文学修养、个人性格情趣有异，语言风格当然不同，但从“林译小说”产生的影响来看，文言是当时主要的翻译语言。

本书对译后规范的界定包括译者在完成文本转换之后针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所写的文字，如译序跋等，也包括读者对译本的评价。译者和读者普遍重视对译本的阐释和接受，这是清末民初小说翻译重要的译后规范。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讨论翻译规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什么样的译者决定什么样的翻译规范存在，译者不同的身份定位决定他们在翻译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第四章着重讨论了译者“译者，艺也”和“译者，释也”这两种身份定位，结合清末民初小说翻译家的自身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身份定位进行了阐述。本书明确指出，他们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具有强烈干预意识的“创作者”和“阐释者”，这个观点为下一章讨论译者对翻译规范的应对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选取1899-1916年间的54篇译序跋，通过数据统计的方法找出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即这个时代译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语言和文学比较。其中翻译目的的“功利性”（意识

形态的动机)和中西文学比较(诗学的动机)是译者关注的两个焦点,在译序跋涉及的主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充分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译者“以文治国”的观念。在有关译者对翻译规范的配合与抗衡的讨论中,本书对译序跋中关于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语言和文学比较的论述逐一进行分析,重点放在译者在序跋中所表达思想与当时翻译规范之间的异同,一方面体现翻译规范对译者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凸显译者在翻译规范面前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从发刊词中发现,清末民初小说报刊杂志创刊宗旨经历了从“开启民智、改良社会”到“消遣娱乐”再到“有益于社会和道德”这样的轨迹。与此相比,小说翻译发端期确立的功利性翻译目的贯穿整个时期,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是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被称为“政治性的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某种文学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时,适用于该文学形式的翻译规范可能滞后于其文学规范。但本书同时也发现,其间也有一些译者明确提出以介绍新小说类型或娱乐读者为翻译目的,他们在各自序跋中对于翻译目的的阐述证明了译者在已经成为社会规范的翻译目的面前仍然会表现出相当明显的个性。

对于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翻译方法,翻译界和文学界已经形成了“意译”或“译述”的共识,本书分析了促成这种翻译方法形成的六个因素:一、开启民智的翻译目的;二、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三、译者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四、对小说翻译这一新生事物认识的匮乏;五、译者普遍低下的外语水平;六、日本“豪杰译”的影响。这些是试图从宏观的角度解释“意译”或“译述”生成的原因,但作为当时身在其中的译者并不可能对此有如此全面的认识。从译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译者采用译述手法起制约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文学传统和读者意识。在译序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译者既有表现出朴素“忠实观”的,也有无视翻译和创作的区别任意删改原著的,还有高瞻远瞩从文化差异角度论述如何有效传达原文意旨的,这些观点同时或交叉存在,呈现出一定的多元性,反映出清末民初的小说译坛尚未形成明确的翻译观。

尽管文白参半作为翻译语言的规范被清末民初的小说译坛所接受,文言小说的明显优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小说译者的这种语言选择除了他们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新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士大夫阶层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白话文翻译带来的负面作用。

文学比较是清末民初小说译序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的不少小说译者本身就是精通诗文的作家,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和鉴赏能

力。对于他们来说，翻译西方小说一方面可以完成开启民智图存强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独特的创作经历。在译介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或拒绝，而是以一种创作者的责任感阐释着中西小说的异同。林纾是强调中西小说之同的代表，他凭着文学家的敏感和批评家的眼光，将外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在写作手法和故事题材两方面进行对比，从而树立翻译小说的合理性。在林纾之外，有不少译者在译序跋中从中西文学之异的角度对中西小说进行了对比，他们的目的是通过介绍与中国小说不同的特点强调翻译小说之“新”，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批评，引进新的小说题材和写作手法。重视译本的阐释和接受是这个时期重要的译后规范，那些致力于中外文学比较的译者遵守了这一译后规范，从而在当时的文坛和译坛树立了权威。

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规范都不会始终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就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而言，这种多样性也同样存在。第六章以梁启超、林纾和周氏兄弟为例，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的多样性进行了探讨。本书认为，林纾的翻译活动从1899年一直持续到1924年去世前，在小说翻译最兴盛的时期，他无疑是“主流规范”的代表人物。而在他之前倡导并实践小说翻译的梁启超以及在他之后开启一代新风的周氏兄弟则分别可以代表过时的规范和前卫规范。通过对梁启超、林纾和周氏兄弟所遵循翻译规范异同的分析，我们更加明确了翻译规范这个概念的描述性，考察翻译规范必须采取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无法以对错优劣来加以评价。这种基于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多样性的客观认识对于我们正确看待整个翻译史上存在的翻译规范也是不无裨益的。

第七章是结语，对在翻译研究中翻译规范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阐发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以及本研究对当代译者的启示，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意义和可能性。笔者认为，和传统的翻译史研究相比，通过翻译规范来研究翻译活动和译者可以避免让过多的细节弱化各个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意义，并能使对翻译活动特征的描述呈现出最大程度的条理性。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时间界定	2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概况	3
第三节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和小说翻译研究的回顾	5
第四节 多元系统理论和翻译规范理论的启示	13
第五节 描写的研究方法	20
第二章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缘起	24
第一节 “中体西用”的失败	25
第二节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27
第三节 传统诗学和西方话语的助力	3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31
第三章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透析	32
第一节 解读图瑞的翻译规范理论	33
第二节 译前规范、操作规范、译后规范	37
第三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译前规范： 翻译传统和翻译方针	38
第四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操作规范	52
第五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译后规范	53
第六节 本章小结	56
第四章 清末民初小说译者的身份确定	58
第一节 翻译研究的分期与译者的隐形和现身	58
第二节 译者的身份定位	61
第三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家的身份定位	65
第四节 本章小结	68



第五章 从译序跋看清末民初小说译者对翻译规范的应对	70
第一节 译序跋的重要性.....	71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说译序跋概览.....	73
第三节 译者对翻译规范的配合与抗衡.....	10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20
第六章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121
第一节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	122
第二节 林纾和“林译小说”.....	123
第三节 周氏兄弟的超前性.....	12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29
第七章 结语	131
第一节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131
第二节 本研究对当代译者的启示.....	133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意义和可能性.....	135
参考文献	137
后记	145

第一章

绪论

在历史泛黄的背景里，有一群拖着长辮戴着瓜皮帽的中国文人正伏案疾书，这一次，他们手中原本用来宗经载道、怡情遣兴的毛笔所书写的却是一个个来自西洋的故事，那里有巴黎茶花女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有福尔摩斯惊心动魄的探案故事，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奇思妙想，面对这陌生而神秘的一切，他们显得既兴奋又郑重。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手中的域外小说被赋予了一份特殊的使命，它们要为中国人充当一扇可以远眺的窗口，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洋的社会情况及思想意识，从而达到新民强国的目的。

这是一个翻译小说大盛的时期，翻译小说的数量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当之无愧地列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次翻译高潮之一¹。然而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虽仍沐浴在他们的恩泽中，他们那原本并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却已经更加模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清末民初的这些小说译者及其译作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有人被后世提及，也多半是因为他们在小说翻译之外所建立的权威和地位，如梁启超和周氏兄弟。在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的价值体系里，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著而受到批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不能跻身于正统“翻译作品”之列。虽然这段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翻译活动自身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但由于这些翻译作品从总体上不符合过去百年间以“信、达、雅”为圭臬的翻译标准，因此，在传统的翻译理论框架里审视这个时期的小说翻译，我们无疑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

1 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和文学翻译；“五四”以来的现代翻译。本书讨论的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同一事物得出不同结论，往往是因为论者的视角不同，或是在历史资料发掘和使用方面存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异。所以，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只有转变视角，把视线从单纯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选择以译序跋、发刊词、书评等文本外材料为线索研究这个时期的小说翻译规范以及译者在翻译规范面前的应对，希望从这些与译作直接相关的文本外材料中了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复杂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了解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如何配合和抗衡这些规范，并由此去理解他们为了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巨大鸿沟之间搭设起沟通的桥梁所作的努力。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颠覆前辈学者所认为的此期小说翻译以“意译”和“译述”为主要翻译方法的结论，而是关注这个结论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意译”和“译述”的翻译方法为何成为一个时代小说翻译的共同特征？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决定译者的种种选择？译者在社会文化等制约因素面前何去何从？这些翻译小说因而而获得了在译入语文化里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本书通过客观描写此期小说翻译产生和运作的历史语境，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并希望证明：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能囿于文字或文学价值的判断，而要考虑到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讨论历史事实，否则，任何结论都可能失之偏颇。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时间界定

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出现的这次小说翻译高潮，学术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近代小说翻译”¹，有的称之为“晚清小说翻译”²。论者往往根据讨论目的的需要选择某一个名称，有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不严格界定名称所指的时间跨度。还有很多时候不同论者虽然使用的是同一名称，但所指的时限并不相同。由于本书讨论的背景是从 1898 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到“五四”前夕

1 施蛰存.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 翻译文学集·导言. 上海书店, 1990;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阿英. 晚清小说史. 东方出版社, 1996;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王宏志(编). 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的小说翻译，因此将其界定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¹无疑更为确切。

把1898年作为一个分界线有两个原因。其一，1898年以前，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小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1872年刊于《申报》的《谈瀛小录》（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睡七十年》（即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连载于1873年至1875年《瀛寰琐记》三至二十八期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1882年画报新报馆译印的《安乐家》、1888年天津时报馆代印的《海国妙喻》（即《伊索寓言》）、1894年广学会出版的美国小说《百年一觉》，其中《百年一觉》和《安乐家》是外国人翻译的，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中国翻译文学”²，其他几部中国人翻译的作品也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足以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期。³

其二，1898年这一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刊行，第一次把西方的现代自然哲学系统地介绍进来。同一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林纾和王寿昌开始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并于次年推出，“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从此，小说翻译大盛。

把晚清小说翻译的研究延续到民国初年也有充分的理由。“五四”运动以前，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但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发生突变的契机，社会转型仍未达到临界点。对于小说翻译来说，对它产生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没有改变，活跃在清末的一批小说翻译家仍继续从事小说的译介工作，翻译的题材和方法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1898年到“五四”前夕这段时期内集中出现了一大批翻译小说，虽然每部作品、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特征，但这些个体汇集成了一种时代的话语，使这个时期的译作和译者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共性。这些共性的存在使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概况

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代。这一期间的翻译小说到底有多少，由于统计方法和涉及年份的不同，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阿英

1 本书的论述将一直使用“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这个概念，但在引用其他论者的观点时，会保留“晚清小说翻译”、“近代小说翻译”这样的表达方式，如果所指没有冲突，将不做特别说明。

2 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指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3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2-25。

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翻译小说 608 种，涵盖了光绪初年（1875 年后）至辛亥革命（1911）时期的翻译小说。日本学者樽木照雄教授等人编有《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进行增补修订后，他所收 1840—1920 年的翻译小说约 2504 种¹。

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一应俱全，其中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的数量尤其令人瞩目。这些小说类型之所以能够盛行，不仅仅因为其文学体裁的新颖，同时也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愿望和需求。国人厌弃封建制度和虚伪的共和制度，在列强的压迫欺辱下，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人们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²应该说，在林林总总的外国小说中，当时的译者并不是随意选择翻译的对象，而是带有一定的翻译动机，这股翻译热潮迎合了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和启迪民智的需求。

可以说，外国主要著名作家的小说作品都在这个时期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些小说向当时仍在中古梦乡里酣睡的中国读者展示了世界各国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给他们带来了民主思想、自由平等的观念和竞争进取的精神。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写道：

是必今之社会，向以塞聪蔽明，不知中国外所有之人种，所有之风俗，所有之饮食男女，所有之仪节交际，曾以犬羊鄙之，或以神圣奉之者，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也；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觉大快。³

从创作角度来讲，翻译小说在价值观念、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写作技巧（如第一人称叙事、倒叙、插叙，以及环境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等）上都对当时的文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当时一些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都明显从类似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⁴。不仅如

1 樽木照雄.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 王宏志编. 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2000: 157.

2 张萍. 侦探文学在中国的两次译介热潮及其影响. 中国翻译, 2002 (3).

3 徐念慈. 余之小说观. 陈平原、夏晓虹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11.

4 袁进在《试论近代翻译小说对言情小说的影响》一文中提供了很多实例。参见王宏志编. 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206-224.